

普

希金诗歌在,光焰万丈长。今年是诗人诞辰220周年,离开我们也有182年,但他的诗歌却在世间广为传唱,一如他自己的预言:“不,我不会完全的死去,我的灵魂在我的诗歌中,将会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而且绝不腐朽……我的声名将会传遍整个俄罗斯大地,现存的一切民族都会诉说我的名字,无论是高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芬兰人,还是现今野蛮的通古斯人,和草原的朋友卡尔梅克人。”不过骄傲的诗人没有想到,他的英名在俄罗斯大地之外依然如雷贯耳,在他心念念却未能成行的中国甚至成立了普希金学会,对他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而且常说常新。

的确,伟大的诗人从来不是单一构成物,而是复杂矛盾的综合体。普希金的生命尽管短暂,但其内涵却有着海纳百川的容量,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兼容并蓄了很多异质的成分,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如果说一个人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复杂矛盾的程度,还在于截然对立的元素在他身上和谐共存的程度,那么这倒是一个阐释普希金伟大的绝佳角度。在他身上,我们发现了至少三种对立的融合:天上神和自然人的对立;生活的极端和创作的中庸的对立;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对立。这三种对立完美地共存于普希金一人,共同造就了他的伟大。

天上神VS自然人

作为“俄罗斯文学之父”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无疑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他写作主要靠天赋,丝毫不努力。人生主要的时间都花在了沙龙、舞会、妓院、赌场。卡拉姆津夫人曾说过:“普希金只有在生病或无法外出的情况下才写作,一旦康复,便又混迹于各种娱乐场所。”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脚是普希金最为多产的“波尔金诺之秋”——如果不是因为瘟疫封路,普希金只能在被困的领地写作,我们今天可能见不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全本。可是即便如此,诗人在短短37年的生命里为后世留下了783首诗歌和一系列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民族文学奠基之作。这样的天才,按果戈里的话来说,200年才出一个。普希金诗神的地位在他生前就已经奠定了,死后经过屠格涅夫、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名文学家的褒扬和推广,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进一步神化,而在20世纪苏维埃时期,他成为万众景仰的诗神,名字遍布百余个文化机构,他的画像雕塑如同领袖的画像雕塑一般随处可见至今仍有增无减,今年6月5日,在俄罗斯谢列梅捷沃机场竖起了一座人工建造的普希金纪念碑,这座俄罗斯第一大机场同时被冠以普希金的大名。总之,普希金在俄罗斯的声望给人的印象就是: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但是这样的天神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和凡夫俗子并无二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不如普通大众。根据法国传记作家亨利·特罗亚的《天才诗人普希金》

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二十周年

关于普希金的三个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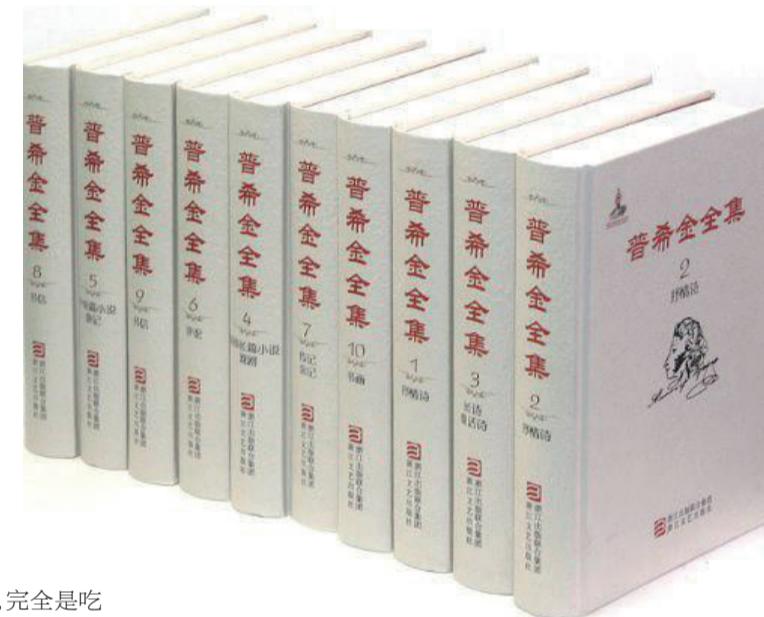
□王宗琥

生活中的极端VS创作上的和谐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基本不懂相对性的意义,俄罗斯人的心灵渴望完整性,它不接受将一切事物分门别类,它追求绝对。易言之,俄罗斯人喜欢极致,要么是一切,要么是零。正如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写的那首著名的诗:“要爱就爱到疯狂,要吓就吓个半死,要骂就骂个狗血喷头,要砍就一劈两半……”普希金的极端反映在他对生命极限体验的追求上:爱情、决斗和赌博。这三样是最富刺激性的人生感受:爱情是人类感情的极端表现,决斗是面临死亡的极端体验,赌博是冒险、偶然性和过山车式大起大落的刺激体验。

爱情占据了普希金生活的大部分。他很小就对女性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据他自己说,他第一次感受到爱的冲动是在7岁。他比皇村的同学们都早熟,也更了解女性。他的“纯非洲式”色欲叫人吃惊。从1812年起,尚未满13岁的普希金就爱上了一个名叫科朱贝依的伯爵小姐,并向她献诗。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终日游走在裙裾之间。他追逐女性不分年龄大小,也不考虑对方的社会地位和名声,甚至爱上了文坛泰斗卡拉姆津的妻子。1829年他在乌沙科娃姐姐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两份“唐璜”名单,分别是她精神上的恋人和肉体上的占有者,共计37位。后来,他在给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的诗中称,妻子是他的第113次爱情。

决斗也是普希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这位年轻的诗人脾气暴躁且非常傲慢,一言不合就决斗,这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事情。卡拉姆津夫人在1820年3月23日写道,“普希金几乎每天决斗一次。但



多亏上帝保佑,每次都不是致命伤,双方总是安然无恙地归来。”据后人统计,诗人生中与人决斗大约30次,为女人,为尊严,甚至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决斗。按照传记作者特罗亚的解释,普希金从步入生活起,就感到应该蔑视危险,他按照自己的信念为自己准备了一种辛辣、矛盾而又紧张的生活,只有生活在极端欢乐和危险之中,他才感觉到幸福。

赌博也是诗人平生所好,据《天才诗人普希金》记载,“只要一见到绿桌毯和扑克牌,他就会晕头转向,他会不顾一切向命运挑战,要么大发横财,要么就破产。这种极端做法很符合他冒险的性格,他希望像在天上一样,一生一世打骨牌、玩扑克”。的确,诗人的所有稿酬都流到牌桌上,莫斯科警察局把普希金列为著名赌客第36号”,他著名的戏剧作品《黑桃皇后》,正是他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

普希金之所以迷恋爱情、决斗和赌博,恰恰是因为这是生命中的极限体验,这种体验能为人带来最大限度的存在感。作为一名天才式的人物,普希金对生命的感受阈值要比一般人高。普通人的日常欢乐无法激起他生活的欲望,只有极端的生存体验,比如爱情、决斗和赌博,才能让他感受到存在的意义,或者像特罗亚所说,“只有生活在极端欢乐和危险之中,他才感觉到幸福”。

可是,这位在生活中处处寻求极限体验的浪荡公子,在创作中却以和谐的中庸之美著称。首先,普希金在诗歌创作中极为重视形式的和谐,那些优美动听的抒情诗无一不是结构、音韵、节奏和谐统一的典范。他最为有名的“奥涅金诗节”就是鲜明的例证:每一诗节中包含十四个诗行,每行中包括4个抑扬格音步,每音步两个音节。这十四行诗中,每行结尾为轻音者,谓之“阴韵”,9个音节;每行结尾为重音者谓之“阳韵”,8个音节;阴阳韵变换的规律和诗行间押韵的规律之间又有严格的配合,这十四行诗的押韵规律是:ABAB,CCDD,EFFE,GG。各行音节数为9898,9988,9898,88。这些严格的规定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奥涅金诗节”特有的格律特征。白银时代著名批评家罗扎诺夫认为,普希金“是创作所有诗歌形式的天才,他能自如地运用八行诗和抑扬格,他的心灵是融合了全世界音响的共振器。他从完整的世界上撷取声响,并将新的音乐涌现出来,从而使世界更为丰富多彩,在普希金之后,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普希金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明亮的忧伤”,这个词组本身就反映了一种中和之美。忧伤是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底色;明亮是诗人赋予生活的亮色,这层亮色在很大程度上中和了生活的忧郁。比如在《我曾经爱过您》这首诗里,前面讲述爱的绝望和痛苦,后面却表现出一种真爱的坦荡:“我爱您是那样真挚和温柔,希望别人爱您也能像我一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凯恩》《我曾经爱过您》都是如此,原本忧郁的过往,到最后都有一个光明乐观的结局。此外,《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塔季扬娜的形象也是一个和谐理想的化身。普

希金的艺术世界是光明和谐的,他为俄罗斯文学奠定了一个完美的开局。

在现实的世界里迷恋极端的生命体验,在艺术的世界里却保持中庸之美。也许是因为艺术世界是诗人理想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和谐完美的。现实的世界紧张激烈,危险刺激,但是恣意任性的后果往往带来撕心裂肺之痛,故而需要平和,需要安宁。正因为现实生活充满了极端体验,所以必须在艺术的世界中营造和谐的天国,这正是艺术对抗现实的伟大功能。或许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普希金艺术世界的中庸之美实际上也是一种极端的追求,是对美的追求。普希金在创作上的一丝不苟,正是追求艺术极致的表现,是在艺术世界里追求极限体验。但是不管哪种情况,都是生活与艺术相互作用的结果。

民族性VS全世界性

普希金的民族性毋庸置疑,他是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奠基者。在他之前的文学,并不接触实际生活,不反映现实,只是某些贵族沙龙的消遣品。只有普希金使文学具有了为民族事业服务的价值。这首先源于普希金对俄罗斯民族的深刻了解,不仅是自己所属的上流社会,而且包括广大的普通人民。他从小熟读从罗蒙诺索夫到茹科夫斯基的一切文学作品,又从奶奶那里汲取了很多民间文学的精华;他喜欢去集市和普通人家聊天,把他们的语言纳入自己创作的语言当中。他所有的创作都忠实地反映了俄国的现实,传达了民族精神的实质。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被别林斯基称为“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所以果戈里说:“一提起普希金,立刻使人想到他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这个权利无论

如何是属于他的……在他身上,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灵魂、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性格反映得如此明晰,如此纯美,就像景物反映在凸镜的镜面上一样”。

但是在这位俄罗斯民族文学奠基人身上传出却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世界性。普希金的世界性首先体现在他知识体系的世界性上。由于贵族式家庭教育,普希金从小学习过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此外他还通晓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和一些斯拉夫语。多语种的学习让他有机会通过原文阅读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11岁以前,他就阅读了父亲书房的所有书籍,包括哲学著作、18世纪自由派的小册子、色情故事和百科全书。之后在皇村学校的图书馆,更是大量阅读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开端的世界文学。有学者统计,普希金翻译和模仿的作品涉及60多位外国作家和翻译家,例如古希腊、罗马的阿那克里翁、色诺芬、贺拉斯、奥维德,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帕尔尼、梅里美,英国的莎士比亚、约翰·班扬、司各特、拜伦、柯尔律治、华兹华斯,苏格兰的麦克菲森,德国的歌德,意大利的但丁、阿里奥斯托,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美国的华盛顿·欧文,巴西的冈扎加,塞尔维亚的卡拉吉奇,波斯的萨迪,荷兰的塞昆德以及传教士西林等。

普希金知识体系的世界性使他将吸收的世界文化有机地纳入自己的作品,在文学创作中大展才华,从而成就了创作的世界性特色。据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张铁夫先生统计,仅《叶甫盖尼·奥涅金》一部作品就提到了50余位外国作家和学者。此外,普希金还写了不少世界题材的作品,比如早期以古希腊罗马文学和神话为题材的诗作《勒达》(1814)、《阿那克里翁之墓》(1815)、《真理》(1816)、《牧神与牧女》(1814-1816);再如支持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诗《战争》(1821)、《短剑》(1821)、《忠诚的希腊儿女啊,不要哭……》(1821)、《我们又一次赢得了荣誉》(1829)。19世纪20年代,普希金还写了一组关于拿破仑的诗。但是诗人的目光并不仅仅注视西方,他还写了不少以东方文化为主题的诗歌,有宗教题材的《我是一个孤独的播种者》(1823)、《先知》(1826)、《仿古兰经》(1824),也有纯东方风情的抒情诗,比如《致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1824)、《埃及女王》(1824)、《夜莺与玫瑰》(1827),以及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1823)、《茨冈人》(1824)等。

普希金的世界性还体现在一个非常独特的能力上,那就是他与全世界共鸣的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名的“普希金演说”中指出了诗人这独一无二的才能:充分地、完美地再现其他民族的天赋能力,也就是呼应世界的能力。世界上任何诗人,无论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还是拜伦都不具备这个能力。只有普希金写哪国人像哪国人,写别国的事完全看不出来是外国人的手笔,只有他能够把自己的精神体现在其他民族的精神中,而且体现得十全十美。

那么普希金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一对立的命题怎样统一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出了完美答案:全世界性、全人类性正是俄罗斯民族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俄罗斯民族精神力量的归宿正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联合,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梦想。“是的,俄罗斯人的使命就是全欧洲和全世界的使命。要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成为完全的俄罗斯人也许意味着(归根结底,请注意这一点)只有成为所有人的兄弟,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就是属于全人类的人。”所以普希金的民族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他的世界性,而且他是俄罗斯民族性与世界大联合的先行人。

普希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伟大个体。上述三个对立命题也许远不是普希金矛盾性的全部,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之所以伟大的辩证逻辑:对立双方是相互依附相互决定的,没有这种对立,没有这种深刻的矛盾性,就不可能有旷世奇才的出现。普希金的所有天才、创作的秘密及其世界性的意义都来源于这种对立,这也许就是一把打开普希金伟大之处的密钥。

